

论毛泽东的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思想

李华兴 王冷一

独立自主和对外开放的辩证统一,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但经受了中国革命建设的严峻考验,而且为无产阶级理论宝库增添了光辉的篇章。在向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军的新的长征中,重温毛泽东的教导,继承这份宝贵的精神财富,无疑将会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

一、独立自主思想的历史发展

独立自主原则,起初是中国共产党人处理与共产国际关系的经验总结,之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新中国的对外关系及经济建设中,得到不断的丰富和发展。

《毛泽东选集》中首次出现“独立自主”一词,见于1937年11月12日发表的《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毛泽东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的报告提纲中指出:“一定要实行‘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这个原则,一定要克服投降主义或迁就主义。”相隔一年后,毛泽东又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结论中,就“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也即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作了有针对性的专题论述。

但是,独立自主的思想,毛泽东早已有之。1930年,针对党内严重存在的教条主义错误倾向,毛泽东明确提出了独立自主的思想。他在5月发表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特别强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而不能依靠外国的什么指导中心,尤其不能接受不明实情的瞎指挥。

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和推动下,以国共两党为主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了。这个统一战线,没有共同纲领和组织形式,它由国民党当局“接纳”各党派参加抗日,中国共产党则从“阶级斗争的利益必须服从于抗日战争的利益”的民族大义出发,加入统一战线,拥护国民党政府抗日,苏联和共产国际视几百万国民党正规军为中国抗日主力,而不相信中国共产党及其所属武装力量会成为抗日战争的领导者和主力。在这种情况下,“一切经过

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无异自捆手脚，任凭国民党溶化和瓦解自己，但若盲目地、不加节制地对国民党进行斗争，势必又导致统一战线破裂，不利于民族抗日大局。既要维护民族团结抗日，又要维护“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就成为整个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必须正确处理的一个突出问题。

为了纠正和防止右倾思想，毛泽东在抗战初期就明确提出，必须坚持党对抗战统一战线形成了。这个统一战线，没有共同纲领和组织形式，它由国民党当局“接纳”各党派参加抗日，中国共产党则从“阶级斗争的利益必须服从于抗日战争的利益”的民族大义出发，加入统一战线，拥护国民党政府抗日，苏联和共产国际视几百万国民党正规军为中国抗日主力，而不相信中国共产党及其所属武装力量会成为抗日战争的领导者和主力。在这种情况下，“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无异自捆手脚，任凭国民党溶化和瓦解自己，但若盲目地、不加节制地对国民党进行斗争，势必又导致统一战线破裂，不利于民族抗日大局。既要维护民族团结抗日，又要维护“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就成为整个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必须正确处理的一个突出问题。

为了纠正和防止右倾思想，毛泽东在抗战初期就明确提出，必须坚持党对抗战战争的领导权，八路军应该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建立独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独立自主的重要含义是：“必须保持加入统一战线中的任何党派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既容许各党派互相联合，又容许各党派独立存在。在毛泽东看来，“保存党派和阶级的独立性，保存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不是因合作和统一而牺牲党派和阶级的必要权利，而是相反，坚持党派和阶级的一定限度的权利，这才有利于合作？也才有所谓合作。否则就是将合作变成了混一，必然牺牲统一战线。”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是要保持自己已经取得的阵地，但主要目的是为了发展这个阵地，动员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毛泽东提出的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是把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巧妙结合的光辉典范。他的理论化为具体的行动便是：领导全党系统清算王明的右倾主张，反复重申独立自主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保持对国民党错误政策进行批评和斗争的自由权利，在思想

上保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在组织上保持党的独立性,坚决拒绝国民党派它的党员到边区和军队中来,保证党对军队和根据地的绝对领导权。在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陕甘宁边区成为中华民国特区的情况下,为了实行独立自主原则,毛泽东又制定了“先斩后奏”、“先奏后斩”、“斩而不奏”、“不斩不奏”的具体策略,体现了原则性和灵活性的高度统一。此外,还规定“有理斗有利、有节”的原则对顽固派作针锋相对的斗争,制定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总方针,以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些,都是毛泽东独立自主思想在斗争实践中发展的成功经验。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之一,而独立自主,则是坚持统一战线必不可少的原则。

抗日战争胜利后,美蒋玩弄和平阴谋,妄图诱骗共产党人交枪做官。当时,国际共运中出现了一股交枪逆流,斯大林也低估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认为“中国发展起义是没有前途的”,中国共产党“应加入蒋介石政府,并解散他们的军队”。毛泽东抵制了斯大林的错误,强调“人民的武装,一支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坚持独立自主,以革命的两手反对反革命的两手,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教育了人民,并做好了武装自卫的准备。全面内战爆发后,毛泽东坚信不但必须打败蒋介石,而且能够打败蒋介石。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依靠人民自己的力量,用小米加步枪的劣势装备,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的独立自主思想在处理对外事务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贯彻和发展。《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为保障我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战争政策。”1950年,毛泽东领导全党独立自主地决定,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挑起抗美援朝的重任。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做出的出兵参战的决定,既体现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也充分显示出爱国主义精神和独立自主保卫祖国的胆略与勇气。1954年,我国又倡导了举世闻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于第二年出席亚非会议,开创了独立自主的中国外交的新局面。

四千年文明古国和中华民族悠久历史的自豪,百年来饱受帝国主义侵略之苦的历史创伤,不屈不挠奋斗不懈的革命家的顽强品质,赋予毛泽东以强烈的民族自尊和民族自信。他十分珍惜国家的独立,民族的利益,敢于藐视强大的对手,可以承受任何压力而不动摇,为新中国赢得

了巨大的尊严。任何国家任何党,只要一旦损害中国的国家独立和民族利益,毛泽东必然奋起抗争。如1958年,苏联利用我国在海军建设上希望得到帮助的机会,向中国提出了建立长波电台,潜艇基地、共同舰队等无理要求,毛泽东当即严正拒绝,并向赫鲁晓夫尖锐地指出,这是要控制、要租借权,“是对我们民族尊严和主权的侮辱”,中国不能接受,你们可以说我们是民族主义,我也可以说,你们把俄国民族主义扩大到了中国海岸。

毛泽东的独立自主思想,不仅表现为敢于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而且还表现为尊重别的国家和党的独立自主权。志愿军入朝前夕,毛泽东谆谆教导:“我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境内,必须对朝鲜人民、朝鲜人民军、朝鲜民主政府、朝鲜劳动党,其他民主党派及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同志表示友爱和尊重,严格地遵守军事纪律和政治纪律,这是保证完成军事任务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政治基础。”

毛泽东反对别人对我们发号施令,也反对我们对人家发号施令。革命不能输出,经验不能照搬。他在和拉美一些马列主义兄弟党的代表谈话时亲切地指出:“我奉劝诸位,切记不要硬搬中国的经验。任何外国的经验,只能作参考,不能当作教条。一定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本国的具体情况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一个国家革命的成功,主要靠这个国家本身条件的成熟。决不允许外来的强制和包办代替,更不能以任何不平等关系强加于别国。这是毛泽东独立自主思想的精华,也是他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几十年革命经验的重要结晶。

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毛泽东强调自力更生,发扬人民群众的主人翁精神,独立自主地走中国自己的工业化道路。毛泽东关于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以及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方针,是不同于马克思设想的工业化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以及苏联提出的先工业化后集体化的方针的。毛泽东着重指出,必须从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的实际出发,正确处理重工业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充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这样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重工业才能有较多的资金积累,在经济落后的社会主义大国和穷国中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必须坚持勤俭建国的方针,厉行增产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在此期间,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逐渐暴露出来的问题和错误,引起毛泽东的严重关注。怎样以苏联为借鉴,少走弯路?毛泽东结合中国实际,发表了著名的报告《论十大关系》,深刻地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

对我国独立自主地建设社会主义,提出了很多可贵的思想。

归结而言,毛泽东的独立自主思想可以大体概括为z在国内革命和建设,我们的方针要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独立自主地走适合中国国情的自己的路F在国际交往中,我们既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也要尊重别国独立自主的权利。

二、对外开放思想的逻辑演进

尽管毛泽东生前没有用过“对外开放”这样的词句,但实际上,他的论著和实践,已经在广义上奠定了我国对外开放的指导思想和基本轮廓。毛泽东的对外开放思想,主要内涵包括:中国是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接受平等基础上的国际援助,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洋为中用,同一切友好国家和民族发生广泛联系与往来,在向敌对国家开展外交斗争的同时,争取这些国家人民的友谊,适当情况下做些生意。

新民学会时代,毛泽东已是“身无半文,心忧天下”的热血青年。他胸怀宽广,志向远大,具有社会剧变时期所需要的那种强烈的开放意识和进取精神。毛泽东主张,新民学会的会员要立志“向外发展”,“我们的同志,应该散于世界各地去考察”。因此,新民学会成立之后,首先就组织会员去法国勤工俭学,寻找救国救民的科学真理。

青年毛泽东认为,应该鄙弃某一部分一国家私利的思想,而重视人类全体的幸福。他提倡世界主义,认为:“世界主义,就是四海同胞主义,就是愿意自己好愿意别人好的主义,也就是所谓社会主义。凡是社会主义,都是国际的”,不应带有单一国家的色彩。1920年,在法国的新民学会会员来信提出,应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的指导方针。毛泽东接信后非常高兴,立即回信说:“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方针,正与我平日的主张相合”1921年在长沙召开的新年大会上,国内会员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反复认真地进行讨论,一致同意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的指导方针。这是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之间搭起一座桥梁的最初构想。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由于民族危机的加深,由于国民党经济总崩溃,由于苏维埃运动的胜利,使中国革命形势更进一步发展起来,使中国革命推进到了世界革命中特别显著的地位。”即使在根据地被国民党白色恐怖四面包围,几乎无法同外界发生任何联系的情况下,毛泽东等人在《中华苏维埃共和

国临时中央政府对外宣言》中,一方面强调要“联合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的民众起来推翻世界帝国主义的统治”,另一方面仍然表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并不反对与世界各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重新订立完全平等的条约。在苏维埃区域内,这些国家的人民在不违反苏维埃一切法令条件之下,可以有经营工商业的自由。”也就是说,只要帝国主义国家尊重中国的主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愿意同他们建交,订立完全平等的条约,保护他们合法经营工商业的自由。这显然不是对外封闭,而是主张在维护主权独立和国家平等条件下的对外开放。

长征结束后,延安成了相对稳定可靠的后方,毛泽东得以集中精力系统地研究理论问题,他的对外开放思想也逐渐成熟。为促成建立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毛泽东呼吁实行“抗日的外交”,即“立即和苏联订立军事政治同盟,紧密地联合这个最可靠最有力量最能够帮助中国抗日的国家。争取英、美、法同情我们抗日,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条件下争取他们的援助。”他认为:“我们的敌人是世界性的敌人,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而中国抗战的进步性和正义性,必定能赢得广大外来的援助。外援包括物质上的和道义上的,只要对我有利,就可大胆接受。后来毛泽东总结说:“‘不要国际援助也可以胜利’。这是错误的想法。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时代,任何国家的真正的人民革命,如果没有国际革命力量在各种不同方式上的援助,要取得自己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胜利了,要巩固,也是不可能的。”

1940年毛泽东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赋予对外开放思想以全新的内容。他指出:民族文化应当同别国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相联合,建立互相吸收和互相发展的关系。他强调:“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请注意,毛泽东在这里说的是“大量吸收”,而不是“少量吸收”,要的是“进步文化”,而不是落后文化,更不是反动文化。这段话,从定量和定性两个方面,规定了文化领域对外开放的科学内涵。毛泽东还明确提出,进步文化不仅仅是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文化,“还有外国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对于一切外国的东西,不能囫囵吞枣,正确的做法是:“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全盘西化的主张是极端错误的,形式主义的方法也是

有害无益的。打破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作风,代之以理论联系实际,对中外文化进行比较、消化、选择、吸收,才是创造中华民族新文化的科学方法和正确态度。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还初步取得了对外开放的实践经验。在毛泽东的具体指导下,我们不但接受了苏联的物质和道义援助,也接受了其它国家诸如医疗等各种形式的援助。通过西方进步记者的大量报道,延安及时向世界宣传了中国革命的真实情况。在重庆,周恩来等人按照毛泽东的指示,集中了优秀的外交人才,积极争取西方反法西斯势力,参与国际统一战线。1943年3月,当第14航空队在美国援助下成立时,中国共产党在《新华日报》著文,赞扬美国是民主国家的兵工厂。如果追溯中国共产党和美国官方的最早交往,那也是在友好的气氛中开始的。1944年7月27日,第一批美国官方的代表——美军观察组到达延安,周恩来亲自到机场欢迎。同年8月15日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为此专门发表了社论,毛泽东修改社论时,在“美军观察组”一词后面还亲笔添加了“战友们”的称呼。那时,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确实衷心希望能够和美国人民、美国政府建立友好和合作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党和政府的对华援助,有利于我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50年代,毛泽东从当时的国际关系出发,明确地指出:“为了使我国变为工业国,我们必须认真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谁给我们设计和装备了这么多的重要工厂呢?美国给我们没有?英国给我们没有?他们都不给。只有苏联肯这样做,因为它是社会主义国家,是我们的同盟国家。除了苏联以外,东欧一些兄弟国家也给了我们一些帮助。完全不错,一切国家的好经验我们都要学,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这一点是肯定的。但是主要的还是要学苏联。”至于帝国主义国家,我们也要团结那里的人民,并且争取同那些国家和平共处,做些生意,制止可能发生的战争,但是决不可以对他们怀抱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因此,“巩固同苏联的团结,巩固同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这是我们的基本方针,基本利益所在。”客观历史表明,是帝国主义的封锁、禁运、包围和敌对行为,迫使中国“关了西方、开了东方”,采取“一边倒”的立场。

即使在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尖锐对立的态势下,毛泽东一面警惕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颠覆、渗透及和平演变,一面始终将这些国家的反动统治集团和人民区别对待。他指出:

“只是美国的统治集团不好,美国人民是很好的。……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终究会冲破杜勒斯之流的障碍,日益广泛地发展起来。”所以,“在国际上,我们必须和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和人民团结在一起,……只要我们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和团结国际友人,我们就会是永远胜利的。”

当朝鲜战争使中美关系处于最紧张的关头,毛泽东表现了高超的斗争艺术。他强调,“我们不怕美国的封锁,我们也不急于要同美国建交,不急于进联合国,我们奉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外交政策。”“要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毛泽东当时倡立的中美大使级会谈,也是中国外交在特定条件下的一种创造,它使中美两个大国在互不承认的对立情况下,有了一个沟通和联系的渠道。“两国互不承认,却有会谈关系;没有外交关系,却又互相派出大使进行长期会谈;双方还可以达成某种协议,即协议声明,创造了协议上你讲你的,我讲我的新写法。这在国际关系史上也是独树一帜的。”这种独创性的会谈,不仅起到了表明中国的立场、态度,并与美国进行直接斗争和交涉的作用,也为打破封锁、实现全面的对外开放准备了条件。因此,两国虽然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却是互相了解底细的,直至后来通过“乒乓外交”走到一起。这就是中美大使级会谈15年的意义所在。

三、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的辩证统一

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是相反相成的两个方面,它们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既要独立自主,又要对外开放,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立足于把自己国内的事情搞好——这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什么时候这个问题处理得好,中国革命和建设就会顺利向前发展,反之,则会遇到难免的挫折。

关于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的辩证关系,延安时期毛泽东已有论述。他说:“自从帝国主义这个怪物出世之后,世界的事情就联成一气了,要想割开也不可能了。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但是这不是说我们可以不需要国际援助,不,国际援助对于现代一切国家一切民族的革命斗争都是必要的。”从这个观点出发,毛泽东主张:“中国共产党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是在彻底打倒日本侵略者,保持世界和平,互相尊重国家的独立和平等地位,互相增

进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及友谊这些基础之上,同各国建立并巩固邦交,解决一切相互关系问题,例如配合作战、和平会议、通商、投资等等。”“中国人民欢迎许多外国政府宣布废除对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并和中国订立平等新约的措施。但是,我们认为平等条约的订立,并不就表示中国在实际上已经取得真正的平等地位这种实际上的真正的平等地位,决不能单靠外国政府的给予,主要地应靠中国人民自己努力争取,而努力之道就是把中国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建设成为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这些主张中的很多光辉思想,日后成为新中国对外开放的基本原则。

正因为抓住了矛盾的主要方面,所以毛泽东在处理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关系上,表现出了高度的原则性和灵活性。对于中国革命,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是做过不少错事的。抗战爆发后,它在积极寻求同国民党政府建立紧密联系的同时,却在某种程度上适应了蒋介石的需要,企图限制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面对这样错综复杂的局面,毛泽东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既对第二次国共合作做些让步,又明确让步是有限度的,提出了改国民党反动独裁政体为各党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民主、自由列入统一战线纲领的主张。他坚决拒绝丢掉人民自己的政权和武装,去依附蒋介石国民党,并放手实行游击战和持久战。当时如果不这样做,人民的力量就不可能壮大,抗日战争的胜利也就不可能是人民的胜利。

对于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斯大林“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一九四九、一九五 两年对我们的压力更大。”这里,斯大林处理对华、对中国共产党关系的出发点,仍然是苏联的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他曾宣称,中国共产党不是真共产党。面对这些言论以及苏联在中国领土上谋求权益的行为,毛泽东始终坚持正确的原则立场,并采取了高度策略的斗争艺术。他既不直接干预苏联和美、蒋所从事的外交交涉,也没有直接反对斯大林的谈话。相反,继续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继续尊重斯大林的重要历史地位,随后使得苏军出兵东北对日作战,成为中国革命力量大发展的重要国际条件。

新中国成立后,按照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全国经济建设和文教建设的支出总额为766.4

亿元。大量的资金从何而来?毛泽东坚持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一五”时期,国家财政收入共为1354.9亿元,国外贷款为36.4亿元,外债仅占总收入的2.7%。这个比例说明,我们主要依靠内部积累来取得经济建设所需资金,没有举借奴役性的外债。自力更生,不排除接受外援,但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千方百计地企图绞杀新生的人民中国,从他们那里,不可能得到平等基础上的援助。正是在国际关系存在两大阵营尖锐对立的格局下,毛泽东才提出了“一边倒”的口号。需要说明的是,“一边倒”只是我们的政治立场,而不是外交政策,瑞典、丹麦、瑞士、芬兰等西方国家,1950年即与新中国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

在社会主义时代,如何处理中国和外国关系?如何处理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的关系?对此,毛泽东1956年在理论上曾有深刻的阐发和精辟的论断。他毫不含糊地说:“我们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我想是提得对的。”其所以是对的,因为这个口号完全符合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利益,完全符合辩证唯物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他说:“应当承认,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不然它为什么能存在?为什么能发展?同时,每个民族也都有它的短处。”正因为别的国家有长处,所以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正因为我们自己有短处,所以有向外国学习的必要。另一方面,正因为别的国家有短处,所以不能盲目地学,把外国的东西照搬照抄,正因为我们自己有长处,所以不能妄自菲薄,崇洋媚外,毛泽东强调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自然科学方面,我们比较落后,特别要努力向外国学习。但是也要有批判地学,不可盲目地学。”他还着重指出:“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此外,有些资本主义国家在处理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关系方面,也有值得研究的经验。上述全方位地“向外国学习”的论断,不仅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而且也对当前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具有直接指导意义,因而是加快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方针。

60年代,我国面临苏美两霸东西夹击的危险。全国人民耳际,一直轰响着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反帝反修,要准备打仗的声音。十年文革时期,毛泽东在对外开放和向外国学习的思想上和实践上产生严重失误,以致陷入新的闭关锁国而难以自拔。激于小生产者的保守排外和夜郎自大,文革时期对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先进经验怀有强烈的偏见,在反对所谓“爬行主义”的口号下,批判引进,拒绝交流。由于极左情绪的膨胀冲击了外贸、外交领域,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涉外事件,严重损害了我国的国际声誉和对外关系的发展。基于夸大的“世界革命中心”和“唯我独革”的自我感觉,不恰当地对外输出革命,引发了一系列国家类似红卫兵的运动;对第三世界国家进行了大大超出国力的援助,据统计,仅1968年至1976年,我国给第三世界的经济援助即高达160多亿美元,其结果是,中国处于新的自我封闭状态,失去了一次极为有利的经济起飞的时机,更加落后于世界先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耽误了自身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毛泽东一生只去过两次苏联,从来没有到过西方发达国家。越到晚年,他越依恋中国传统的历史经验,很少吸收新思想,甚至把外来的有效理论当作洋教条加以排斥。以军事理论而言,当时苏军的大纵深突击理论,美军的有限战争理论,他一概不予理采,而一味坚持大打、早打、打核战争的观点,到处“深挖洞”搞全民武装,相信游击战术,欣赏“四个第一”,过分夸大人的精神作用,为林彪的“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等军事唯心主义思想的泛滥提供了温床。所有这一切,都是毛泽东认识的偏狭部分过于膨胀的结果。

“文革”是中国的一场灾难,这是历史已经做出的结论。然而,毛泽东即使在晚年,仍然奉献了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赢得了第三世界国家的广泛支持和热情赞扬,70年代和周恩来等运筹帷幄,运用高超的斗争策略和外交艺术,以中美关系正常化和中日建交运为契机,打开了向西方开放的通道,并为今天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毛泽东关于在对外开放的同时必须防止和平演变的思想,对现实生活更是帖防腐药和清醒剂。

在论述毛泽东理论贡献之际,人们不能不深思并感到惋惜的是,他的对外开放思想很多并没有能化为实践。原因当然错综复杂,不能简单片面地做出回答。

马克思恩格斯说得好:“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除了上述毛泽东个人因素而

外,我们还需要对当时的国内外环境进行具体分析。从外部环境考察,主要是受帝国主义封锁、包围、颠覆、渗透和敌对政策的威胁,受战后两大阵营对垒和冷战的影响,受到一系列危及新中国安全和主权的战争(如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柬埔寨战争、中印、中苏边境冲突)以及台湾海峡紧张局势的制约。这就是说,对外开放的实现,需要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国际和平环境和比较正常的国际秩序,而在毛泽东时代,这方面的条件相当欠缺。从内部因素分析,如果不清除“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影响,如果不将全党工作重心真正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如果不打破小生产者的狭隘眼光、经验主义和保守自大,如果仅仅想用“自我封闭”来防止和平演变,而不是以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和以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心态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不断提高全民族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那么,不仅对外开放无法实现,和平演变也难以防止。

在处理独立自主和对外开放两者的辩证关系中,有一些教训也是应该记取的。首先,要克服思想方法的片面性,避免从好事中引出不好的结果。从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取得了不少成就,这是好事。但由于我国的经济条件,几乎是在同外界完全隔绝或基本上没有外援的状况下取得的,因而客观上滋长了忽视对外开放和样样自己干的倾向。其次,要重视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发展商品经济,势必要求对外开放否定商品经济,难免走向闭关自守。经济上的对外开放,从实质上说,就是我国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世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相互联系、交往和竞争。发展这种联系、交往和竞争,目的是为了取长补短、互通有无、互利互惠,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已经证明,采取闭关自守或严格限制对外开放的做法,并不能保持社会主义制度的纯洁性,反而有可能因为彼此差距的扩大而导致人民对社会主义信念的动摇。再次,意识形态的分歧,不应该成为国家关系和对外开放的障碍。只要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符合中国国家利益,有利于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对任何国家和地区都应该主动开放。只有学会使用国内国外两个资源,打进国内国外两个市场,搞活国内经济和发展对外贸易两手并用,才能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因此,真正的对外开放应该是全方位的,不仅包括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也包括第三世界和不发达国家。

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需要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各国联系的日趋密切,使当代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都难以闭关自守,但是,我们的基点,一定要放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对外开放虽然是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是增强自力更生能力的重要途径,然而,没有独立自主,就掌握不了对外开放的主动权和平等关系的钥匙,就不可能使对外开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催化力量;反过来说,没有对外开放的独立自主,也决不可能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文化,迅速消除中国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因此,不能形而上学地将独立自主和对外开放绝对地对立起来。正确地把握两者辩证统一、相辅相成的关系,既要坚持独立自主,又要反对闭关自守,既要坚持对外开放,又要反对全盘西化,既要学习外国的先进文化,又要警惕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只要我们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全面理解并在实践中发展毛泽东关于独立自主和对外开放相结合的思想,克服它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一定能在科学的轨道上加速前进,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同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将毛泽东关于独立自主和对外开放的光辉论述付诸实践,加以发展,使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短短十几年里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这就是最有说服力的历史证明!